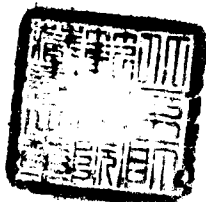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6635

1066635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

责任编辑：李克珍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00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统一书号：11209·18 定价：2.40元

出版前言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收录历史论文共三十五篇，分为蒙古史、元史部分和中国近代史部分。其中蒙古史、元史论文十一篇，除一篇外，均写于解放以前，中国近代史论文二十四篇，全部为解放后著述。

邵循正先生字心恒，福建福州人，生于一九〇九年，逝世于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邵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近代史，一九三四年在法国法兰西学院研究蒙古史，一九三五年赴德国继续研究工作。一九三六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一九四五年应聘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并赴欧洲大陆短期讲学。一九五二年以后邵先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主持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北京市史学会副会长。

邵循正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先后担任民盟中央科教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委员等职务。

邵循正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蒙古史、中国近代史学者，治学谨严，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意及波斯、蒙古等多种文字工具。他的早期著作《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于一九三五年列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公开出版，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

收入本文集的论文是邵循正先生一九三六—一九六四年所

作。蒙古史、元史方面的著作，四篇是刺失德丁《史集》（邵译《集史》）个别篇章的汉译和笺释，七篇是关于蒙古和元代的历史、语言、文学等专题文章。邵先生运用中外史料，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对蒙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独创的研究。他关于《史集》和《马可波罗行纪》评述的深刻性是公认的。文章中大量的中外文献对勘和语言对音考证，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厚功力。邵先生也对明清史下过功夫，开过明清史课程，本文集的一些文章所论问题的内容，实际上通贯元、明、清以至于中国近代、现代。

收入本文集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课题，侧重点在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官僚势力的关系》、《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论郑观应》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析周密深刻，常有新见，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邵循正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本文集的整理校订，蒙古史、元史部分主要是张广达同志做的，周良霄同志也参与了这一工作；中国近代史部分是陈庆华同志做的。他们都是邵先生教诲有年的学生。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语言与历史》和《释Narigai, Nacigai》两文也是邵先生的学生方龄贵同志根据邵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讲演记录，特为整理，寄给我们的。这些同志本着对业师的怀念之情，为这本文集的出版，尽心尽力，我们深为感激。

为了尽可能保持原貌，稿件中除了明显的笔误或印刷错误之外，我们一律未加改动。文章编排，大致以写作或刊行先后为序。

我们谨以此文集的出版，来纪念邵循正先生逝世十周年。

一九八三年四月

代 序

邵循正，字心恒，福建省福州市人。国内外知名的蒙古史、中国近代史学者。祖父邵积诚，光绪末年贵州布政使。邵循正生值清政府覆亡、民国初建的动荡时期，家道中落。幼年由祖母启蒙读《四书》，后入私塾就学。1924年入福州英华书院。1926年初考入福州协和大学，同年夏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1930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改习历史，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近二十万字，被选刊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1934年初由清华大学派往法国留学，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研攻蒙古史，学习波斯文；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蒙古史一年有余。1936年由法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蒙古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随赴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专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蒙古史、波斯文和中国近代史诸课。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与陈寅恪、洪谦、孙毓棠、沈有鼎诸先生联袂赴英，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研究蒙古史；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文大学作短期讲学，介绍中国学术文化。1946年冬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讲授元史、清史、中国近代史，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授中国近代史。

解放后，邵循正于1950学年度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2—1958年任该所史料编辑室主任，主持编辑《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两套近代史资料丛刊。1962年赴莫斯科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磋商中、苏、蒙三国共同编写蒙古史计划，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邵循正在蒙古史方面有突出成就。蒙古史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领域，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过不同深度的探讨。这门学科的难度较大，语言文字要求较高，因此研究往往受到局限。如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系根据波斯人刺失德丁的《集史》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以补证《元史》之不足，为中国史学家利用西方著作研究蒙古史作了开拓工作。但洪钧对《集史》一书的使用是通过俄人贝勒津的俄文译本又经译员口述（“舌人”）转译的，难免有失误之处。邵循正熟谙英语、法语，懂得德语，学过波斯人、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和满文。他的几篇有关蒙古史的文章如《〈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1936年），《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1947年），《刺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未刊残稿），《刺失德丁〈集史〉铁穆耳汗纪》（未刊残稿），是采用布洛舍（Beochet）刊本的刺失德丁《集史》，直接从波斯文将蒙古帝室的蒙哥汗、忽必烈汗（及其后妃）及铁穆耳汗的本纪译为汉文并加以考释。他能把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汉文资料（《元史》）、波斯文资料（《集史》）和法、德、英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揉合参证，旁征博引，得心应手，这是许多前人所未具有的条件。他通过汉文史籍译音纠正了波斯文史籍音符、音点的讹误，又反过来根据波斯文史籍订正了汉文某些译文的差错，作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

邵循正用蒙古文、波斯文和元代汉语音韵相互对音，对元代

汉语用音规律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精辟考证有助于元代汉语音韵研究。他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知识与历史史实考订的关系，特别擅长追溯各种语言之间的转借以订正历史史实。如在手稿《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一文中讲到《游记》对元世祖忽必烈时王著杀阿合马一案的记载，纠正了一般认为《游记》所说的主谋汉人Vanchu就是王著、Cenchu就是张易或陈著（参见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的谬误，指出根据元代汉语读音来对音，Vanchu应为“万户”，可能是《元史》中的崔总管，而Cenchu应为“千户”，可能是《元史》中的王著。邵循正以渊博的学识，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把语言学熟练地运用到历史、文学与社会的研究，为蒙古史的研究开拓方向。

邵循正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着力于两个范围的研究。一是中外关系，一是中国资产阶级问题。

他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虽然是一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但也可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外关系的代表作之一，它已经摆脱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垄断近代中外关系研究的局面。论文参照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籍，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把外交史和政治史融合为一体，从追溯中、法、越关系入手分析中法战争，其功力之深，视野之广超过了同时代的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和中国旧式封建学者。当时的邵循正尚未接触到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但论文从国际公法的角度驳斥法国政治家和学者为其侵略中国和越南辩护的种种谬论，其爱国热忱溢于文辞。但自此以后，邵循正没有在中外交涉这一领域继续深入下去。解放后，他虽然发表了数篇涉及中外关系的论文，如《美国侵华的路线和作风》（1950年11月），《所谓“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1950年11月），《西沙群岛是中国

的领土》（1956年7月）和《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1956年6月）等，但所投力量不多。

解放以后，邵循正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已不再停留于研究各国政府间的折冲樽俎，而是利用他对中外关系的深刻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他最关心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特点。

1954年他发表了《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实质上就是把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发展过程之一，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具体运用于中国近代历史。这篇文章说明了邵循正对辛亥革命前近代政治历史分期的看法（1840-1860年；1860—1895年；1895—1905年；1905—1911年），也提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提纲。

继之，邵循正从几个关键问题入手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进行探讨。

一、邵循正十分注意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特别重视当时研究极少但在买办官僚势力中极为重要的盛宣怀的作用。五十年代他主持领导陈庆华等整理标点盛宣怀部分未刊函稿（《盛宣怀未刊信稿》，1960年中华版）。邵循正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十分重视，他就官督商办问题剖析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向及其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的几篇论文（《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从募集商人资金到官僚私人企业》1963年；《关于洋务派民间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业》1964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

二、邵循正对一批与洋务派有不同程度关系的唐廷枢、徐润，特别是郑观应的作用十分注意。陈庆华和邵循正曾整理郑观应的著作，邵循正最后写出《郑观应》一文（1964年4月）。郑观

应，出身洋行买办，深受洋务派赏识重用但终究从洋务派分化出来，而成为维新派思想家；与孙中山有交往但终于支持立宪派保皇；痛恨洋务派压抑民族资本但最后为盛宣怀奔走。对这样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邵循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三、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领导农民。邵循正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时着重分析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1961年），对与会党有密切联系的光复会陶成章等人的活动十分注意。

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影响政治历史发展的大局。邵循正自三十年代研究中法战争时就注意张佩纶、邓承修等清流派；他对1861年的北京政变十分注意，为《热河密札》作了注释。他还请人抄录了《翁同龢日记》，拟加标点注释由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后这项工作中断。

邵循正在学术研究中乐于与史学家探讨商榷。他曾与汪敬虞就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往返撰文交换意见。直到邵循正逝世十年后，汪敬虞还继续就这一问题发表文章（参见汪文：《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续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邵循正对农民战争在打击封建势力中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1961年2月），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地位问题（《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1961年9月）都发表了与一些学者商榷的意见。

中国近代通史的建设关系到全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邵循正为此投入很多力量。解放初期与翦伯赞、胡华合写《中国历史概要》，此书译成多种文字发行国内外。他所草拟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经高等教育部审定通行全国。他还与陈庆华

合写《中国史纲要》近代部分。

邵循正十分关心近代史籍资料整理工作，校注梁廷枏的《夷氛闻记》（1959年中华版），整理柯悟迟的《漏网喁鱼集》（1959年中华版）、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1960年中华版）。

1972年邵循正再次被指名参加二十四史标点整理工作，继续负责《元史》部分，他不顾劫后余生兢兢业业全力以赴，1973年4月27日终于在此岗位上猝然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邵循正才思敏捷，领悟力强。1971年陈垣逝世，他与邓广铭共议致一挽联。他迅即草就：“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成夙愿；校讎称绝学，不为乾嘉作殿军。”邓广铭认为“绝学”两字欠妥，他当即改为“校讎捐故技”，依然对仗工整。此联切合陈垣生平事业，堪称佳作。

从治学通路上来看，邵循正不仅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雄厚条件：掌握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中外学术根柢深厚，所写文章主旨分明，自成格调；而且具有宏观眼光，能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在错综复杂现象中抓住关键，带动全局。这后一优点在解放后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等接触切磋中得到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邵循正留下来的著作未能充分表现他的才智所能达到的成就，未能为蒙古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更乡贡献，这是不能不令人为之再三惋惜的。

张 寄 谦

1985年1月3日

D-47/19

目 录

代序.....张寄谦(1)

《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

后记考.....(1)

刺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译释(残稿).....(8)

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19)

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下).....(66)

刺失德丁《集史·铁木耳合罕本纪》译释(残稿).....(75)

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86)

元代的文学与社会.....(99)

蒙古的名称和渊源.....(106)

语言与历史

——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112)

释Narigai、Nacigai.....(118)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120)

美国对华侵略的作风和路线.....(127)

所谓“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

——一九〇〇年美国对中国的领土阴谋.....(138)

评《美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论丛》(一).....(143)

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

势力的关系.....(147)

中日战争.....(160)

戊戌变法.....(173)

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187)

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	(193)
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197)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	(202)
天主教士中的两个特务间谍——樊国梁和安治泰	(204)
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的抢劫行为	(209)
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意义	(214)
校注《夷氛闻记》序	(226)
略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	(232)
关于《漏网喁鱼集》的一些说明	(236)
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	
——关于具体说明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些问题	(242)
关于《盛宣怀未刊信稿》的说明	(258)
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	(264)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281)
《中国伊朗编》中译本序	(296)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问题	(301)
论郑观应	(323)
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	(349)

《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 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

世祖后妃，据《元史后妃表》（106）可考者十人：

大斡耳朵——帖古伦大皇后（据特薛禅传，〔《元史》卷118〕知其为弘吉烈氏）。

第二斡耳朵——察必皇后，喃必皇后（皆弘吉烈氏，自有传）。

第三斡耳朵——塔剌海皇后，奴罕皇后。

第四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阔阔伦皇后。

所守斡耳朵无考者，——八八罕妃子，速哥答思皇后，撒不忽妃子。

以上十人，除察必喃必自有传，及帖古伦一见于《特薛禅传》外，余皆无考，且氏族多佚。《柯史》第四斡耳朵下，有乌式真皇后，大抵据刺失德丁《集史》（*Djami-el-tévārikh*）所增。①波斯文《蒙古帝室世系》（*Moezz-el-ansāb*），中录

①柯史《后妃传》（104）所记，率本旧史，独于第四斡耳朵下，不录伯要兀真皇后，而代以“乌式真皇后，许兀真氏，功臣博尔忽女，生子曰脱欢，曰爱牙赤”。余未能纵检群籍，不敢确定此文所本。疑其出处，不外拉史《忽必烈合罕纪》（*E. Blochet*校本，II，367）或《突厥蒙古部族考》旭申（许兀真）条（*Bérézine*校本，*Trudy vost.otd.* VII，224）。然拉史明云脱欢为伯要兀真（Bayāūčīn）皇后所出（*Blochet*，370；*Trudy vost.otd.* VII，237）柯史以乌式真皇后子，误。且伯要兀真皇后，名见东西史籍，柯氏亦见此文，然其史摭去不录，岂疏漏耶。北京大学所刊柯氏遗著《译史稿》（卷六，页十二，十三），可参阅。

世祖后妃，共八人。原名如下①：

本黎巴	本敦倫	本黎巴	本敦倫
全	مانغو خانون (2)	全	خانون خانون (1)
全	اوغس خانون (4)	全	سور خانون (3)
全	حورماجين خانون (6)	全	ماما وحي (5)
ماما خانون	ماما خانون (8)	مورفاحس خانون	قورقالحس خانون (7)

此书抄缮多讹，又常脱“标音点”，欲正其读，极费斟酌。细玩所载，知其均出刺史，而间有误解。刺史所录世祖后妃如下：

(甲) Čābūi-khatūn：世祖长子朵儿只(Tārčī)，三子(安西王)忙哥刺(Mingqāla)，四子(北安王)那木罕(Namūghān)之母；(按亦即次子真金母)，宏吉烈氏，按陈那颜(İlči-noyān=alči(alčīn-)-noyan)②女，为世祖诸皇后妃子中最尊贵者。③此即《元史》之察必皇后。上表之〔1〕即此后，-i误为-n，《集史》各写本多然，即Bérézine所校定《部族考》中误亦同，④不足异。拉史于世祖次子真金(Čimkim)条，言其母名Taikhū，义为“合罕之母”。⑤此特华语“太后”之音译，为成宗时追尊察必皇后之称。上表之〔2〕即拉书之“太后”，拉书此段文句稍混《世系》以为另系

①不列颠博物馆藏写本(Or.467) fol.52v-53r；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写本，(Ancien fonds Persan, 67) fol.51v-52r(下文简称世系)。

②参阅《元史特薛禅传》；又元史二，太宗八年有按赤那颜，即此人。

③Blochet, 352-62.

④Trudy vost. et d. VII, 202.

⑤Blochet, 354.

一人，遂致误。然拉书上文明言：

“忽必烈合罕十二子中，察必可敦所生四子最著，亦如成吉思汗诸子中，孛儿台夫人(Barta-fučin)所生四子最显”。①其《部落考》亦云：

“察必(原作Čabūn)可敦生四男五女”。②

即《世系》本书于察必皇后下亦注云，“氏宏吉烈；真金，那木罕(〔〕ūmānqan = Nāmūqān) 忙哥刺(Mangqalān = Mangqala)之母”。虽遗朵儿只，然当知拉史Taikhū与察必实为一人。顾又列Taikhū-Khatun，不亦疎乎？

(乙) Qūrūqčīn-Khatūn; 世祖五子Qāridai(名不见《元史》母，蔑儿乞(Markit)氏，Tūqtā-Begi(脱脱)弟Qūtuqū之女③世祖最先娶之为后。④此后于《元史》无考，《世系》之〔7〕Qūrqałčīn即此。《世系》原文曰：

“Qūrqałčīn-Khatūn又号〔〕ūqčīn，诸后妃中，被娶最先，位亦最高，后被黜”。拉氏《突厥蒙古部族考》蔑儿乞条则云：

“Tūrūqałčīn，⑤ 忽必烈十三岁时，成吉思汗为娶之。其嫁忽必烈虽在众后妃之先，然以无子，位不尊”。

拉史两处所记虽似冲突，然可释为此后生一子伤，后遂无出，早婚之子不育，甚近理，后以无子不显，故母子之名，皆不见于《元史》，然后实世祖元配也。太祖崩之岁(1227)，世祖年十三，故使《部族考》所记不误，则太祖为世祖娶此后，不能后于此岁，亦不能早于此岁，故定丁亥(1227)年，为世祖始婚之岁，

① Blochet, 354.

② 同注五。

③ 《部落考》蔑儿乞条作Qūdū, Trudy VII, 92.

④ Blochet, 363.

⑤ “T”-为“q”之误。

当无疑义也。

前日人箭内互著《元朝 斡 耳朵》一文，^①定察必为世祖元妃，守大斡耳朵，箭内盖未考拉史所记各文，故其论若此。《元史》表谓帖古伦大皇后，守大斡耳朵。于《特薛禅传》则云“帖古伦皇后，按陈那颜之孙脱怜之女”，即察必皇后从孙女；以辈分论，不能居位察必之上，以年龄论，其归世祖，不能在察必之前。于《世祖纪》中统元年条，又云“先朝皇后帖古伦”则竟非世祖之后。其自相矛盾，信如箭内所言。然《世祖纪》之“先朝皇后帖古伦”与脱怜女帖古伦当系二人同名，或异名同译，盖脱怜之女，既不能先察必归世祖，更不能为“先朝后”，其理甚明。又特薛禅传所载，颇有讹谬，难尽置信，此亦当注意者。余意Qürüqčïn可敦，以太祖之命归世祖，又在诸后妃之先，当本为大皇后，守大斡耳朵。后生一子夭折，无子遂不贵，且失宠被黜。此时察必已归世祖，守第二斡耳朵。以按陈国舅之女，又子孙众多，故特尊显。Qürüqčïn被黜后，世祖又纳宏吉烈氏女帖古伦立为大皇后，以继守大斡耳朵（或帖古伦本已在大斡耳朵，世祖使袭Qürüqčïn位），亦如察必卒后，世祖继娶喃必为第二斡耳朵主者然，故帖古伦名见简牍，而Qürüqčïn名反湮没。《拉史世祖纪》所录后妃，皆有子嗣者，帖古伦无子，故名不见西书。此虽假定，然视箭内所言，似较近理。《元史后妃表》所记，虽多脱漏，然均本简牍，^②故同名异译之后妃，常复出，观其失可知其得。则其列察必喃必二后于第二斡耳朵必有所本，非有充分根据，不可轻易抹杀也。

（丙）朵儿边（Dürbān = Dörbān）女某可敦。世祖六子

①《东洋学报》第十卷1—3号，有陈捷陈清泉两君译本（商务印书馆本）页87。

②《元史》106《后妃表》云：“内廷事秘，今莫之考，则其姓名之仅见简牍者，尚可遗而不录乎”。